

非虚构写作为何受关注

□本报记者 黄尚恩

今年以来,图书市场有几本书备受关注,包括梁鸿的《出梁庄记》、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丁燕的《工厂女孩》、王小妮的《上课记2》等。这些被称为“非虚构写作”的作品聚焦于小人物的生活和情感,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下中国的现实。现在多家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专栏,除刊发文学作品还有调查报告、回忆文章等。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可供言说的话题。

真实描绘了现实生活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发展、生活无比丰富的当下,人们更加渴望作家能够揭示出现实的真相。评论家霍俊明认为,目前社会的分层化以及各个阶层的现实和生存图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差异性。这种复杂和差异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写作者的虚构能力。一些作家的想象力已经远远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关乎社会日常生活的个人事件和冲突。

“现实生活比想象和虚构更精彩”,“生活比小说更像虚构”,很多作家、评论家都这样说。记录社会现实和社会事件常常能给读者带来震惊的体验。于是,以真实描绘现实生活为宗旨的非虚构作品开始涌现。评论家张柠认为,写作应警惕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上的“先入为主”,直接进入生活现场去发现生存的秘密。一些非虚构作品借助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力图通过“客观叙述”,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呈现生活的真相。而且,它们大多在关注和描绘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谓的“中心话语”之外的生活和事件,展现出真实经验的残酷性。王小妮在谈到《上课记》时也说:“相比新闻记者关注的那些激烈、爆裂的东西,我更注意的是那些非常容易被隐蔽的细节”。

从表面上看,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是通过两种“途径”获得的:一是在写作之前,作家要进行详细的调查,保证作家“亲历现场”;二是在文本之中,大多有“我”的在场,既是作家本人、也是叙述者,而且还是事件的参与者。写作者亲历现场,才能够透过“符号”、“风景”去触摸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捕捉一个个真实的细节。梁鸿说,平时接到推销电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烦,甚至感到愤怒。如果你知道,自己的一个表妹、堂妹

在做电话推销员时,你就会觉得应该用一种理解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怀着这种“理解的心态”,梁鸿得以了解梁庄的密码,看到梁庄的真实面貌,但也由此决定了梁鸿的“非虚构”并非“绝对客观”,它只是个人的真实。梁鸿表示,“梁庄是我的故乡,它不是一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村庄,在强调非虚构的同时也还是不能脱离我个人这个维度,我始终是以我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乡村。”

将文学带回公共领域

非虚构写作所涉及的领域大多具有公共性。《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危机,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家庭的裂变;《上课记》记录了来自城市、更多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重新呼唤“理想主义”的光芒;《中国,少了一味药》以作家自己“卧底”传销组织的亲身经历,鲜活演绎“传销”这颗社会毒瘤屡除不尽的缘由……

很多专家都曾撰文谈到,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表现现实,非虚构写作都体现出一种“介入性的写作姿态”,改变了以往一些作家依靠“二手材料”进行随意想象的写作习惯。作家们将自己的视野打开,带着一种问题意识、批判意识,深入到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积极地观察社会人生。

与以往宏大的政治性书写不同,现在的非虚构写作更加注重从小的切口进入叙述。评论家张莉认为,非虚构文体的开放性为当代文学摆脱“自传式”、“个人化”的写作习惯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非虚构作品以具体可感的个人经验对蹈空的、大而化之的公共经验进行了质疑和补救,在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之间的紧张地带进行书写。张莉还注意到,在近两三年的非虚构写作热潮中,女性作家的创作尤其引人注目,如梁鸿、乔叶、王小妮、郑小琼等。她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少去刻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但这些文本所呈现的真实的“社会风景”都是通过女性的眼睛来完成的。在描写自己眼中的“世界”和“现实”时,她们所谋求的不是对“个人记忆”的重写,而是希望经由“个人记忆”来重构“公共记忆”,通过“边缘”

与“偏僻”的声音、场景来生产出独具视点的公共议题。

在质疑声中不断成长

“非虚构写作”概念的提出以及人们对它的学理阐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与质疑。

既然已经有“报告文学”的概念,为何还要弄一个“非虚构写作”的提法?这是非虚构写作必须面对的第一个质疑。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看来,非虚构、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报告文学已经完全容纳和体现了“非虚构”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要求报告文学变得更好、更真实,但没必要在此领域树立新的旗帜。至于“非虚构小说”的提法,跟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小说”概念一样,应该被否定。但是,认同“非虚构写作”提法的作家、评论家则认为,报告文学大多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书写;非虚构写作则强调从细微处、从个人感受出发,缓慢渗透,然后“成为一个连筋带肉的综合体”。他们认可“非虚构小说”的提法,认为它是“非虚构”这种文类底下的一种,即用小说化的技巧来使“作品表达出的真实感更集中、更有趣”。

有些作家、评论家提出,“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而“非虚构”只是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因此,一些非虚构作品经常顺从现实的安排,很难从中找到更高的“意义”,同时也放弃了形式上的创造。这是非虚构写作面临的第二个质疑。支持非虚构写作的人则认为,非虚构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并非机械的,在其中也可以体现作家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独立思考,并将现实社会的真实价值和审美意义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来。在形式上,非虚构写作没有太多可供借鉴的模式,但“在最没有形式感的地方反而最出形式感”,因为它的形式和其内容是紧密相连的。

非虚构写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非虚构写作是否排斥“虚构”和“想象”,如何把握好边界?对现实的反映,怎样从“表面的真实”抵达“本质的真实”?对于作家们来说,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只是进入历史、现实的通道和中介,作品写得成功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作家自身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境界。

■按照中央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开展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2日至25日召开专题会议,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回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联系思想和所分管部门单位的工作实际,分析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及有关制度规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5日下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本报讯 中国新文学百年以来,文学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每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时期,都自觉地参与其中。而今,“中国梦”的提出,召唤着文学以更大热情描述中国人的寻梦之旅。参加6月23日在成都举行的2013中国文艺评论年度论坛的评论家、学者提出,“中国梦”包含“文学梦”,“文学梦”当助力“中国梦”。文学应担当起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力量。

此次论坛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四川省作协主办,《当代文坛》承办,议题包括文艺繁荣与民族复兴,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中国文艺走向世界的脚步,中国文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文艺评论现状、问题及走向等。

梁鸿鹰谈到,“中国梦”在文学创作领域就是需要写作者增强原创的意识,多塑造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形象,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出发,展现出民族特色,让中国理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当代文学的鲜明价值。

“中国梦”需要有价值支撑,要以积极的价值观念来构建“中国梦”,而价值观是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细节中的。陆建德认为,这样的价值观能够兼容并包,有助于社会和谐,凝聚人们的力量,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文学在其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作家要有比较的眼光和深邃的历史意识,善于自我认识,敢于自我批评,既要树立文化自信,也要努力深刻反思。

吴俊、洪治纲、张学昕等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常是从探寻梦想开始的。就文学而言,不仅要描绘出我们的梦想是什么,还要更多关注在实现梦想的途中可能要面对什么以及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作家要有意识地建构起积极的核心价值观念,不要一味展示丑恶、暴力、血腥、残酷、悲惨等。同时,作家还要让世界读者看到更多正面的中国元素,把优秀的中国经验转化成人类的经验表达,从而对世界作出贡献。

王一川通过具体分析高晓声的作品指出,在文学艺术中,“中国梦”被作了多种诠释,我们要重点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农民的梦想。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梦想的高度及其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历程,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群体梦想。文学应该真切表现中国农民梦想的历史演变、当前状况及未来趋向。

向荣说,公平正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是协调当下社会矛盾、解决利益冲突、推动社会和谐的首要原则。时代赋予中国文学的历史使命,是以“诗性正义”的文学实践参与进来,提升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一种美学力量。作家要有自己创造性的表达,体现具有个性特色的正义理念,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人类关于正义的思想。

与会者还就文学批评发表了见解。大家谈到,当前文学的思想资源逐渐趋于丰富,文学批评要明确自己的定位、价值观和指向,增强可信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既有助于文学创作,也要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以独特的感染力引领百姓的阅读,促使大众进行合理的精神消费。王彬彬认为,要构建和谐的文学生态环境,显现学理品格。曹纪祖说,文学批评要言说真实,正确处理当下与永恒、时尚与经典、大众与精英、理性与激情等一系列辩证关系。

参加论坛的还有阿来、吕汝伦、袁山山、梁平、钱蓉、程德培、龙协涛、颜敏、李美皆、曹顺庆、朱小如等。

(江 湖)

文学应以更大的热情描述对『中国梦』的探寻

拉近读者与经典的距离

□袁跃兴

近日,有机构在网上公布了一个“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在对近3000名读者的意见进行统计之后,得出结论:《红楼梦》高居榜首,而且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尽数在列,此外还有《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等。

读者们“死活读不下去”的理由有哪些?阅读《红楼梦》,受不了书中的大量诗词,妨碍了理解故事;《百年孤独》外国人名过分冗长,难以记忆;《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篇幅太长,等等。

这个“排行榜”的出现,与当今的文化环境、阅读环境有很大关系。如今,整个社会的阅读生活充满浮躁,浅阅读、碎片化阅读流行,很多人希望通过阅读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马上解决眼前的问题,而阅读名著不可能获得实用的效果,浸染于如此的阅读文化中,很多人不愿再去苦读经典。所以,这个“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实际上是当下图书出版界、读书界“浅阅读”、“碎片化阅读”盛行,远离经典、轻蔑经典的风气的折射和反映,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经典、阅读经典的问题。

但是,这个排行榜是否就毫无意义呢?我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对经典的批评,纵然这种批评也许缺乏根据、充满臆断,但都可以使我们审视当下的经典阅读普及工作做得怎样。经典作品像新作一样受到质疑,显示了这个时代的批评粗野但充满活力,因为只有无人继续阅读经典的可怕时刻,它们才会找到“安宁”。所以,无论价值如何,这个排行榜至少提供了重新审视经典阅读的契机。

人类拥有经典——无论产生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历史时代——这是人类文明历史、文化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要素。我们在谈论人类的文化财富时,往往以人类的经典作品作为象征和代表。经典作品的品质,应该包括它的时代性、民族性、历史性、文化性,它们都是一些表达伟大观念的伟大的作品,这些古老伟大的作品可以看作是文化或哲学的化身。经典作品固然是历史的、传统的,但始终无法切断它们与当代人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精神的,也是文化心理的。经典作品往往反映了人类的一些普遍观念和思想心理,如现实和理想的矛盾、灵与肉的冲突、生与死的叩问、理性和感性的纠缠、善与恶的交锋、对人类终极追求的自觉意识。经典作品超越时代、历久弥新,总能让读者从中找到共鸣,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是经典作品持久的价值。这就是经典对现代人精神和灵魂的深远影响。

真正的经典作品,是养育我们当代人生命的源泉。这种精神财富不能仅仅是一种有关过去的知识,它还必须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样,经典才能永恒和不朽,并使读者对经典充满信心。这就需要经典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解读方式的存在,需要按照当下时代的精神、心理、人情风俗来理解经典、认识经典,需要对经典进行继承和创新。

这些年来,对于经典阅读,文化界、图书界都在通过各种文化方式、传播形式,来吸引大众读者的关注,以期起到推动大众阅读经典的作用,拉近大众读者与经典的距离,让经典和现实、和时代心理结合起来,让经典活在当下、活在当代人的心里。然而,目前这仍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问题。



李洱：坚持写有难度的小说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如果把小说比作景观,读者身临其境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或一览无余,或重峦叠嶂。后者对创作和阅读的要求更高,作家能否呈现世界的复杂,读者又能否发现一草一木的秘密?如今,趋易避难逐渐成为潮流,人们开始怀念有难度的小说,恰如对订制手工艺品的向往。“难”并不带有故弄玄虚的意味,它体现了小说家面对世界和文学的姿态。今天,许多中国作家仍然在坚持“有难度的写作”,在6月24日于郑州举行的李洱作品系列首发式暨研讨会上,许多人都看到了作家的这方面的努力。这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洱作品集共8卷,包括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篇小说集《午后的诗学》《导师死了》《鬼子进村》、短篇小说集《儿女情长》《嗜哑的声音》以及随笔集《问答案》。

“有难度的小说写作”是与与会者最集中的观点,李洱的创作既不是单纯的形式操练,也不是对日常经验的绝对依附。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兴

起给当时的中国小说带来了写法上的“革命”,李洱汲取了这些营养,并以其创作实践对“小说是什么”作出回答。评论家陈福民认为,他在先锋的形式实验和小说故事性之间实现了平衡,既保持了高雅的文学品位,又在技术之外注入了现实,因此改变了先锋文学的不及物状态,他的艺术经验是日常的又是诗学的。“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李洱的作品在‘意味’和‘形式’上都有所突破”。评论家白烨谈到,李洱的作品常常对读者构成挑战,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内容与形式都实现了较好的融合,《花腔》等体现了“收着写”的特点,因此故事精密、感觉精到、语言精致、人物精细。

李洱的小说往往密度极大,他凭借对现实和人性洞察对周遭的一切进行解剖,并在文本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智慧。作家李佩甫、墨白认为,汉语文本如此丰富,当代作家该怎样突破,这困扰了很多作家,尤其当年许多人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在文本上存在局限。李洱做出

了大胆的尝试,其文本的机智和幽默使小说具有丰富的内涵。

北京大学教授黄燎宇用“耍花腔”来界定李洱的风格,认为小说的戏仿和反讽令人印象深刻。他说,李洱的小说既蕴涵了丰富的信息、深刻的思想,又避免了知识分子写作眼界狭窄、不接地气的弱点。他戏仿、消解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以及人们熟悉的语言,小说因此具有了知性又鲜活的语言风格。谈及语言,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觉得,李洱的小说是有声音的,“你能从中听到河南话、上海话、普通话等等,方言在小说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是材料,更是生活”。

自嘲是个“认真的写作者”的李洱并不急于求成,保持着慢慢写的状态,在小说的难度、密度和精度上孜孜以求。他说,对于小说我是悲观的,而对自己的写作又是自信的,于是我总在这悲观和自信中摇摆不定,“我的写作尚未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也远未完成”。